

浦铎及其赋话考述

何 新 文

唐宋以来，谈文话诗的风气盛行，特别是自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出后，诗话、词话、四六话之类著作风起云集，多至不可胜数。但却独无赋话。宋徽宗宣和时，王铨撰《四六话》二卷，其自序云“诗话、文话、赋话各别见”，然今存《四六话》二卷，多言四六表启章奏之语，并未见其赋话之书。直至清乾隆年间，始有赋话著作出现，流传稍广者也仅有李调元《赋话》等寥寥数种。于是，后来学者或以“赋之有话，殆始于李调元之作”^①。

笔者近年来搜集赋学资料，对古代赋论、赋话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究，发现早于李调元而以“赋话”名书者，尚有浦铎《历代赋话》与《复小斋赋话》二书。浦氏二书完成于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年，前者以二十八卷的篇幅，对屈原以来两千年间有关辞赋作家、辞赋评论等方面的大量历史资料作了颇为系统的汇集编排，并且“述而兼作”，有所考订辨析，在当时就得到了著名文学批评家袁牧等人的高度评价；后者则具体评述赋家赋作，谈论体制、作法，发表了不少自己的见解。浦铎一人而有两种赋话传世，这在古代赋学史上是少见的，且就其整体的文献、学术价值而言，也不在李调元《赋话》之下。因此，对浦铎及其赋话作些探讨，不仅于本来就并非丰富的赋话遗产的整理很有必要，对于古代赋史、赋论的研究也是有意义的。

一、浦铎的生平与著述

浦铎，字光卿，号柳愚，室名复小斋，清代中叶浙江嘉善人^②。主要生活年代在乾隆(1736—1795)时期，大致与袁枚、孙士毅等人同时，并与他们有交往。据清光绪十八年刊本江峰青等所修《嘉善县志》及《历代赋话》、《复小斋赋话》有关序跋所载：浦铎为当时“贫士”，淡于仕进，积学工文。其学根柢经史百氏，而尤工诗赋。曾以选拔廷试列高等，但不获铨用，遂赋壮游，足迹几半天下，所到之地，名流无不为之倾倒。乾隆三十八年(公元1773)，天子将省耕津淀，浦铎参与献赋。四十六年，就楚南某中丞之聘^③，主讲粤西秀峰书院，为孙士毅(字智治，一字补山)中丞作《百一山房歌》，后采入袁枚《随园今雨集》。五十三年，从楚南旋归故里，自称“自辛丑(即乾隆四十六年)出门已八年矣，而囊空如故”。同年，道金陵，赴随园简斋看山之约，因以《历代赋话》质之，随园许为“必传无疑”。但至此时，浦铎已“眼暗耳聋，看花如雾，不复能观书”了。《嘉善县志》说他“年八十五卒”，推其卒年，大约在乾隆末世。

浦铎门下，如金汝珪、李宗瀚等皆一时显贵，而浦铎自己则终生不遇。究其原因，或许与他不愿屈志钻营的生活态度相关。在《复小斋赋话》中，浦铎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予读傅长虞《叩头虫赋》，以其谦卑自牧，无往不利，心窃鄙之；及读明人张之象赋，乃谓士之进退，必以礼义，枉己辱身，颇伤志操，……实获我心矣。”可见他在出处进退问题上，是很看重礼义志操，不愿做那种谦卑自牧、无往不利的“叩头虫”的。不能措意于政治仕途，便将才思精力施之于文章著述，浦铎曾在《历代赋话后序》中引刘后村之言来自我表白：“士不幸不遇于当时，所赖以自见于后世者，书耳”。本着这种赖书以自见于后世的信念，浦铎“闭户著书，老而弥笃”^④，“著书等身，皆力求所以立言之

故”^⑤。据《嘉善县志》记载，浦铎就著有《历代赋话》、《复小斋赋话》、《百一集》、《唐宋律赋笺注》、《柳愚诗存》、《羊城集》、《西征集》等多种著作。可惜这些著述大都散佚不传或被人窃为己有，现存者只见《历代赋话》与《复小斋赋话》二种。

这两种赋话，均当完成于浦铎晚年。《历代赋话》一书，“积数十寒暑”之久，“盖五易稿而后成”，是浦铎长期呕心沥血的结晶。此书前有浦铎写于“乾隆阅逢涪滩辜月”（即二十九年甲申十一月）的自序说：“夫诗话之作夥矣，赋则错见于诸书未有集其成者。先兄声之先生尝欲为之，时方卒业《十三经注疏正误》一书，未遑也。予年来稍稍缀辑，渐成卷帙，上自战国，下逮元明，载在正史者为一集一十四卷，博采他书者为一集一十四卷，名曰《历代赋话》。”这说明此书在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十一月，已写完初稿。后来几易其稿，至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全部完成，比李调元写成于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的《赋话》要早。但书成之后，无力付梓，一直到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才刻印问世。

《复小斋赋话》的写作，则是在乾隆三十八年浦铎为天子省耕献赋之后才开始的，所谓“温故有得，辄笔数语”。据浦铎《历代赋话后序》所言，此书至乾隆四十一年也已完成，并在五十三年附于《历代赋话》刻印行世。至光绪年间，浦铎同邑孙福清将《复小斋赋话》从《历代赋话》中别出，单行校刊，又收入孙氏所辑《携李遗书》。

浦铎留传下来这两部赋话著作，对浦铎来说是不幸之幸，对于今天的赋学研究者也是弥足珍贵的。

二、《历代赋话》的文献价值

今传乾隆五十三年复小斋刻本《历代赋话》，全书二十八

卷，包括正集十四卷和续集十四卷两个部分。湖北省图书馆藏本为线装六册，书前载有五篇序文：乾隆戊申（即五十三年）五月随园老人袁枚“袁序”，乾隆强圉协洽（即丁未，五十二年）元月九日仁和孙士毅“孙序”，戊申人日大庾世弟杨宗岱“杨序”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朔浦铎柳愚“自序”和戊申八月中秋日“后序”。此外，还有浦铎写于丙申（即乾隆四十一年）十月二日的《赋话凡例》十条。书末附《复小斋赋话》二卷。

《历代赋话》是浦铎尽数十年思力精心编撰之作，它将历代作赋和论赋史料汇为一集，在结构体例、编排方法上很有特点。因此，此书对于古代赋史、赋论的整体研究，具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首先，是取材广博，资料丰富。

浦铎为编写《历代赋话》，曾再阅二十二史，广泛涉猎诸家文集及说部著作等各类书籍，孜孜不倦地搜集材料，“凡正史稗官，遗文坠典，凡有涉于赋者，无不鳞罗而布列之”（《袁序》）。

如其正集十四卷，以“作赋之人”为纲，辑录正史所载各代赋作者本传中有关作赋的文字、但删去赋篇原文而成，就可以说是一部相当丰富全面的历代辞赋作者生平、创作史料的汇集。编者以《史记》至《明史》二十二史为依据，其中《唐书》则参取新、旧二书；南北朝以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为主，而用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补其缺；《明史》间采横云山人《明史稿》，陈寿《三国志》及赋者甚少，又多采裴松之注，充分体现了编者“意在博综”的取材宗旨。

续集部分以“言赋”为主，重在辑录历代赋论资料，编者遍采散见于正史而外诸家文集以及野史、笔记、诗话、子书、类书、目录学著作等各类书籍中有关历代赋家赋作的品评、序论文

字等，涉及范围极为广博。仅“两汉”卷中，就从明董斯张《吹景集》、《西京杂记》、《容斋随笔》、《西溪丛语》、《大唐新语》、《东坡文集》、《野客丛书》、《汉书注》、《颜氏家训》、《论衡》、《文选注》、《避暑录话》、《法言》、《新论》、《许彦周诗话》、《渔隐丛话》、《栟城先生遗言》、《林下偶谈》、欧阳修《归田录》、《宋景文公笔记》、《梦溪笔谈》、《日知录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冷斋夜话》、宋李壁《四十九章经序》等二十余种书籍内，辑入有关汉赋的言论几十条之多。经过这样的广搜博采，不仅使大量散见群籍的只言片语都汇为一体，而且也使不少罕见流传的材料得以保存下来了。

续集在汇录历代论赋史料时，还间载一二与作赋有关的逸闻、俳谐或怪异故事，“以资谈助”。如卷六录《道山清话》云：

东坡在雪堂，一日读杜牧之《阿房宫赋》，凡数遍。每读彻一遍，即再三咨嗟叹息，至夜分犹不寐。有二老兵皆陕人，给事左右，坐久甚苦之。一人长叹，操西音曰：“知他有甚好处。”夜久寒甚，不肯睡，连作冤苦声。其一曰：

“也有两句好。”其人大怒曰：“你又理会得甚底？”对曰“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。”叔党卧而闻之，明日以告，东坡大笑曰：“这汉子也有鉴哉！”

将日常生活中偶见的趣事具体生动地描述出来，并且很自然地 and 文士谈文话赋联系在一起，让读者在伴有笑声的轻松气氛中领会某种言赋观点，这正是一种同于古代诗话“以资闲谈”式的品评方法。《历代赋话》将这类资料录入进来，显然是受到了诗话的影响，这对于了解古代赋家的生活与创作，并不无帮助。但是，如编者将冯贽《云仙杂记》苏隐夜闻被下有虱齐念《阿房宫赋》、钟谿《前定录》李揆得善《易》筮者王生之絨作《紫丝盛露囊赋》等异闻也稍加辑录，就有点“颇近小说”之怪诞了。

其次，是编排合理，自成体系。

《历代赋话》分正集、续集两个部分，正集以辑录赋家生平史料为主，续集以广收历代赋论资料及作赋故事为主，二者各有侧重而又互为补充，组成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，使全书的结构安排显得十分合理。

在史料的编排上，《历代赋话》采取以时代先后为顺序、断代为卷的方法，后人而论前人之言论则仍入前人时代中。这样一来，既可清晰地显出溯源寻流的史的线索，又能展示出各个时代的面貌。如正集将历代赋作者的生平史料，断代分为战国、前汉、后汉、三国、晋、宋南齐梁陈、魏北齐后周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明共十四卷，起自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，止于《明史稿·奸臣传》所载严嵩为《庆云赋》之事，就完全可以当成一部战国至明代两千余年间的赋家传记通史来阅读。若只截取某一朝代，如将卷二、卷三所载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诗赋略”序文，《汉书》和《后汉书》中有关贾谊、司马相如、王褒、扬雄、汉武帝、班婕妤、班彪、冯衍、班固、崔篆、张衡、马融、杜笃、王逸、王延寿、赵壹、边让、祢衡等赋家的传记史料联缀起来，就构成了两汉一代赋家的专史，可以了解到两汉四百年间辞赋创作的繁荣情况。

续集除将历来散见群书而有关各代赋作的品评文字断代辑录外，还于书末专设“诸家绪论”两卷（卷十三、十四），集中载入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、明陈靖质居士（即陈山毓）《赋选序》、《靖质居士文集》论赋文字、左思《三都赋序》、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、王铨《四六话序》、李膺《师友谈记》所载秦观论律赋、祝尧《古赋辨体》、钟嵘《诗品》、陈岩肖《庚溪诗话》、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、张表臣《珊瑚钩诗话》、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、杨慎《杨升庵文集》、陆机《遂志赋序》、王士禛《居易录》诸序论、文集、诗话、笔记中的重要赋论资料。卷十四还将

《文心雕龙》一书中，散见于《哀吊》、《谐隐》、《风骨》、《情采》、《镕裁》、《章句》、《丽辞》、《比兴》、《夸饰》、《事类》、《练字》、《指瑕》、《总术》、《才略》、《序志》各篇的论赋文字分条辑出。编者将历代赋论资料作如此系统、科学的编排，并对各条资料都注明出处，这不仅可见其用功之勤，而且能为古代赋论的整理、研究带来极大便利。

第三、是述而兼作，有所考辨论说。

《历代赋话》虽是一部汇编有关史料的专书，但编者“述而兼作”（《孙序》），常以“铤按”的形式对所辑史料略作考辨订正，“间有疑误，按以己意，精核而博辨之”（《杨序》），从而使此书又具有了“登高指南”的意义。浦铤所作的按语，有的是对有关史料的补充，如正集卷三录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王延寿“字文考”一段传记资料后，以“铤按”形式曰：“张华《博物志》：王子山尝之泰山，从鲍子真学算，过鲁见都殿赋之，还归本州，溺死湘水。”从而证明“文考，一字子山也”。又，卷六录《南齐书·高逸传》：“顾欢字景怡”，“铤按”曰：“《南史》：欢一字元（即玄）平”；卷八录《旧唐书·玄宗纪》天宝十三载制举加诗赋事，“铤按”引《新唐书·杨綰传》加以补充说：“举词藻宏丽科，玄宗已试，又加诗赋各一篇，綰为冠，制举加诗赋由綰始。”这些材料，对于全面掌握赋家生平及有关试赋的史实，是很有参考作用的。再如续集卷十三关于明陈靖质居士《赋选序》及《靖质居士文集》的两则按语：“居士名山毓，字贵闻，吾邑人，几亭先生之兄也，举万历戊午浙闾第一人。工骚赋，卒年三十有八。所著有《赋略》五十四卷，《明史稿·艺文志》云《赋略》五十卷，《靖质居士文集》六卷。此或即《赋略》之序欤。”“《居士集》六卷，赋居其半……世罕传其书，予故录其目如右，以配几亭先生全书。使邑中子弟知颍川二难，人各有集，亦如陆氏之平原、清河尔”。提供了不易找寻的宝贵

资料。

有些按语则对赋篇存佚或赋作真伪情况作了考辨、说明。如正集卷四关于《魏略》所记邯郸淳“作《投壶赋》千余言”的“铤按”曰：“此赋尚存，不过三百九十三字耳，盖非全本也。”经浦铤这一提示，读者在读《历代赋汇》所录《投壶赋》时，就不会因其首尾不全而疑惑不解了。又如续集卷九录《栾城先生遗言》“公曰余《黄楼赋》学《两都》也，晚年来不作此工夫之文”一段之后，“铤按”曰：“周平园《苏文定公遗言序略》曰：昔人疑《黄楼赋》非出公手，子瞻盖亲为之辩。今公自谓此赋学《两都》，晚年不复作此工夫之文，至《和陶》、《拟古》九首，则明言坡代作。识者当目得之。”这段按语，信而有征，能帮助我们证明苏辙确实作过《黄楼赋》，以断一桩赋坛公案。

有时，编者则借“铤按”以寓己意，或者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，象正集卷一关于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、卷三关于杜笃《论都赋》和续集十关于周敦颐《拙赋》的按语等等。且看置于所录《屈原列传》全文之后的“铤按”曰：“宋荆溪吴氏《林下偶谈》：太史公言离骚者，遭忧也。离训遭，骚训忧，屈原以此命名，其文则赋也。班固《艺文志》有屈原赋二十五篇。梁昭明集《文选》，不并归赋门，而别名之骚，后人沿袭，皆以骚称，可谓无义。篇题名义且不知，况文乎？吴氏之言云矣。余之《赋话》，托始于原，仍班《志》也。”在这里，编者已直接表明了自己关于骚、赋名义及赋话范围的见解。

总之，浦铤《历代赋话》一书，既具有十分丰富的辞赋资料和较为科学、系统的编写体例，又述而兼作，对所辑史料有所论析考辨，它对于古代赋学研究的意义，是不言而喻的。有如孙士毅序文所说：“夫古人登高作赋者，代不数人，人不数首，落落然散布于二十二史及诸家文集、说部中，几人目及之？则古人虽传犹之不传也。得柳愚辑为一篇，六义附庸，蔚成大国，二千年

之词客，聚若比邻……其微显阐幽，功岂浅鲜哉！”

三、《复小斋赋话》的赋评特色

与汇编辞赋史料的《历代赋话》不同，《复小斋赋话》是浦铎的赋论专著。全书分上、下二卷，凡二百六十余则。作者以漫话随笔的形式，或品评赋家风格成就，赏析赋作名篇佳句，或论述体制作法，略载佚事传闻，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观点，表现了他自己的赋学思想和批评特色。

《复小斋赋话》论赋，很重视赋体创作的独创性。浦铎认为：作赋“须自占地步，不可一味作干谒语”，“作赋先要脱应酬气”，要追求一种“皆出己意”的创新境界。因此，他特别欣赏黄滔赋“奕奕生新”，“杨诚斋赋足当一‘别’字，杨廉夫赋足当一‘新’字”；高度评价杜枚《阿房宫赋》“句调皆自己出”，范仲淹赋“如自己出，尤为困难见巧”，从而鲜明反对那种“无有己出”的模拟之风。他说：“雅不喜明人赋，以其模仿而无真味也。”“明人赋专尚模范《文选》，……丁晋公有言：‘司马相如、扬雄以赋名汉朝，后之学者多规范焉。欲其克肖，以至等句读、袭征引，言语陈熟，无有己出。’怎谓数语，切中明人之病。”在此基础上，浦铎还就如何对待古人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科学见解。他主张“学古”而不“泥古”，向古人学习，在于学习古人的精神实质以完善自己，不在于一味模仿古人的字句形式而丧失自己的独创性。浦铎指出：“食古而化，乃为善用”，“文章固有脱胎法，然亦须变化，乃为异曲同工”。学古者，要做到“虽规仿前人，而各成其胜”，有如李太白《剑阁赋》之“绝似古风”，李时勉《北京赋》之“尚有古意”，以至象杜少陵赋，“其沉郁顿挫”，有“纯似汉人处”，“即以句论，如‘降精于金，立骨如铁，目通于脑，筋入于节’等语，正使扬雄、枚皋之流执笔为之，恐未必到此，不如少陵从何处得来。”反之，

“若句摹字仿，规规然唯恐失之，如江淹《别赋》，千秋绝调，明人吴伯允学作《感秋赋》；谢惠连《雪赋》，古今脍炙，袁中郎效之作《玉壶赋》，使人见之欲呕”。这些论述，揭示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，充分体现了浦铣贵独创、反模拟的思想。

与这种思想相联系，《复小斋赋话》尤其注重赋体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真实感情。浦铣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，是具有深厚的思想内质和真情实感的，所谓：“文生于情，情生于文”；

“事寓乎情，情溢于言，事之直而情之婉，虽不求其赋之工而自工矣。屈宋离骚，历千百年无有讥之者，直以事与情之兼至耳。”于是，“文以有情为贵”、“事与情之兼至”，便构成了浦铣品评赋作的重要基石。他既赞赏张九龄《白羽扇赋》“一片忧谗、畏讥、惧祸之心，忠君、爱国、感恩之意，洋溢于行间”，欧阳修“拟赋一道以进，指陈当世得失，言甚切至”，郝经《击跽笏赋》“踔厉风发，读之可以顽廉懦立，是有功世道之文”；也亟推重王粲、黄滔、王桀、范成大、归有光等人并非直接有关君国大事的抒情感怀之作。如他说：“王仲宣《登楼赋》，情真语至，使人读之泪下，文之能动人如此。”“黄文江《送君南浦赋》，王辅文《离人怨长夜赋》，真深于情者。”范石湖《惜交赋》，忠厚悱恻，怆怆动人，有《小雅》、骚人之余风。”“归震川先生《冰崖草堂赋》，句句从肺腑中流出，毫未见雕琢之迹，每三复不能已也。”“祢正平《鹦鹉赋》，颇为自已写照，然略无露才扬己意……余每读其‘女辞家而适人，臣出身而事主’句，辄为歔歔不自禁。”这些赋篇，或抒有志之士怀才不遇的内心苦闷，或写亲友离别思念之情，都是有感而发，情深语至之作，故能令人感动不已。

在赋体作品的艺术风格方面，则既崇尚雄健阔大，也欣赏其他不同的风格特色。浦铣和许多论赋者一样，极推重汉赋，往往以之作为一个高高树起的参照座标来比较、衡量其他的赋作成

果。那么，浦铎为什么要推重汉赋呢？且看他在《复小斋赋话》卷下所言：

汉人赋，气骨雄健，自不可及。唐人中，唯子美学之庶几。予谓如宋陈襄《咸阳宫赋》，气充词沛，自足名家。必欲学步捧心，多见其不知量耳。

少陵诸赋，直欲追踪扬、马，唐人中无其敌手。公自称道扬雄、枚皋之流，庶可跂及者也。

然读少陵赋，当玩其沉郁顿挫，纯似汉人处，不当但论句语。

由这些评语来看，可知浦铎标举汉赋，正是向往一种如汉赋、杜诗那样气象宏阔、气势充沛、骨力劲健、情感内涵深厚博大之美。所以，浦铎津津乐道：潘岳《西征赋》“笔力雄健，虽不及叔皮《北征》，而叙次整齐，造语圆美，转接处恒用对句，论文法则不单薄，讲方段则非平衍。四千余言，读之唯恐其尽”；傅玄《安石榴赋》“其在晨也，灼若旭日栖扶桑，其在昏也，葩若烛龙吐潜光。二句尤阔大”；杜牧“笔力最健，诸赋中，以《阿房宫》为第一”；独孤授《放驯象赋》“局法阔大，造语真挚，尤宜体玩”；“唐宋小赋多为律所拘束，唯元微之体格博大，苏子瞻气局雄健，李忠定词旨激昂，可为鼎足”；“明人古赋，予独取金文靖公一人，以其有大气包举之也”。如此推许备甚，足以见出其审美倾向之重心所在。

但是，浦铎并没有因崇尚雄健阔大而排斥其他的美学风格。他还常常以“清雅”、“清丽”、“流丽”、“精切”、“哀艳”、“秾艳”、自然“天成”等词语来评赏赋篇赋句，判断不同的艺术特色。如说“兰成赋，词清句丽”，“范文正公《老子犹龙赋》，神工鬼斧，不可思议，梦中彩笔”等等。

《复小斋赋话》对于作赋的方法、技巧，更以较多的篇幅作了认真讨论。诸如赋的体制、构思、谋篇、句法、字法、破题、

押韵、描写等，浦铎都结合具体赋篇赋句的实例评析，发表了不少精审的见解。关于赋的篇幅体制，他倾向于陆机《文赋》所提出的“辞达理举，无取冗长”，欣赏那些言约意赡的短小篇章。如评傅咸《燕赋》“不多着墨，而包括无遗”，评李文饶《振鹭赋》“六十言耳，着墨不多，而刻画已尽”，以及提出以“小中见大，寄托遥深”为“咏物之极则”等。关于赋的描写事物，他以为“贵得其神”，如谢观《白赋》之赋“白”：“晓入梁王之苑，雪满群山，夜登庾亮之楼，月明千里”，张阶《黄赋》之赋“黄”：“菊花可折，凝晓露而含光，木叶既零，拂凉风而乱起。”以有形之雪、月、菊花、落叶而写无形之白、黄，不仅语句工雅，而且颇传达出其特质、神韵，达到了“不着一字，尽自警切，同得其神”的境界。关于用典用事，则以为“不说出为高”，如“古人作赋，虽用经语，亦必烹炼”，如王桀《琉璃窗赋》“碧鸡毛羽，微微而雾敕旁笼，玉女容华，隐隐而银河中隔”一联，“上用宋处宗‘鸡窗’事，下用《鲁灵光殿赋》‘玉女窥窗’句，精切而无痕迹。”其《凉风至赋》，用《长门》、《秋兴》二赋，“令人无从下注脚，真上乘矣”。此外，如浦铎所说：“赋贵琢句。同是一意，而用笔反正，加以锤炼，便觉出色”；“作文必用正笔者，笨伯也”；“作小赋必先认题”；“咏物题要切，然亦不可太着迹”；“律赋对句，宜用流水法，既避重复，且有生动之趣”；“作赋不在用事精切，尤在用笔”。如此等等，也都是一些深得作赋要诀的识曲之论。

论赋不以古今，而“以赋为断”，是《复小斋赋话》的又一特色。在古今论赋家中，常有一种“汉以后无赋”、“唐以后无赋”的论点，对汉以后赋、尤其是唐宋律赋及元明时代之赋不予重视。浦铎则没有这种偏颇。《复小斋赋话》论赋，起自屈宋、荀况，止于明季，而以论律赋为主，对元、明赋也多有涉论。在浦铎看来，不同时代的赋家赋作，自有其独至之处，甚或有“后

来居上”、令“前贤畏后生”者。汉赋固当推崇，但汉以后亦并非无赋。比如，唐人赋中，杜甫《雕赋》有扬雄之辈“未必到”的佳句，杜牧《阿房宫赋》、陆龟蒙《青苔赋》虽规仿前人，“而各成其胜”；宋人赋有“胜唐人处”，元人《江汉朝宗赋》有相对于“无足观”的唐赋而“畅然满志”之作；即使“专尚模范《文选》”的明代赋家中，也不乏“可与宋、元人争席”，乃至“宋元人所不及者”。浦铣曾评明杨守陈《伐老柳赋》说：“气充词沛”，“遣言措意，俱极其妙。此种赋，何减元人？余尝汇有明一代之赋，而拜其尤雅者都为一集，庶不为后人嗤点耳。”这些论述，充分表明了他能用实事求是的眼光考察赋史，与那些“汉以后无赋”的论者不同。

《复小斋赋话》所记赋家轶事不多，更没有那种近于小说的逸闻，可见此书作为一部话赋专著是比较严谨的。其中偶有对赋篇真伪的考辨，如卷下所论今传唐人宋璟《梅花赋》为伪作，也有理有据，颇具说服力。

本文在谈《历代赋话》时，曾说浦铣受到诗话的影响。其实，这一特点也同样表现在《复小斋赋话》中。此书不仅如古代诗话那样，以漫话随笔的方式谈赋，其所评对象也很注重作品的“联句”、呈显出一种“联句批评”的评论特色^⑥；而且，作者还常常以诗言赋，如说：“诗有属和、有次韵，惟赋亦然”，“诗有即席，赋亦有之”，“古诗中，多用‘君不见’三字，黄御史滔用入律赋，倍觉媚姿”，“元、白赋另自一体，流动之中加以工稳局法，亦最浑成似其诗也”，等等。这些，当然也是《复小斋赋话》的赋评特色之一。在这里，浦铣既找到了一种有传统渊源的赋话形式，也为赋的理解、品评和作赋方法技巧的讨论揭示了一种最有比照意义的参照系。

《复小斋赋话》限于赋话的体例，在结构形式上显得片断、松散，随意而发，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和论述方法。但就其内容

而言，“博综诸体而归于论律”，所论范围较广，而又突出重点，全书以品评论说为主，记事成分较少，理论性和批评色彩较强，并且有真知灼见，故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赋话专著，它在古代赋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。

今传《复小斋赋话》，所见有如下几种：一是《历代赋话》所附复小斋乾隆五十三年刻本，有浦铕《自序》及武陵王敬禧《跋》；一是清光绪六年孙氏望云仙馆校刊之单行本，除浦铕《自序》外，另有孙福清《跋》；再就是香港大学何沛雄教授据《携李遗书》校点本，载所编《赋话六种》中。

注

①何沛雄编《赋话六种·编者序》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12月出版。

②浦铕字、号，据《嘉善县志》。

③《嘉善县志》载：浦铕“主粤西秀峰书院，为孙补山中丞作《百一山房歌》”，疑“楚南某中丞”，即孙补山。

④孙福清《复小斋赋话跋》。

⑤杨宗岱《历代赋话序》。

⑥据台湾学者张双英《试论联句批评与〈六一诗话〉的关系》一文的研究：“在《六一诗话》出现之后，诗话式的批评几乎成为后代最普遍的批评方式。然而因其所评对象十之八、九是‘联句’，是以我们的结论：欧阳修之后，最通行的诗评方式是‘联句批评’”。张文见《台湾学者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